

美中苏三角关系

(70~80年代)

倪孝铨 罗伯特·罗斯 主编

人民出版社

美中苏三角关系

(70—80年代)

倪孝铨 罗伯特·罗斯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德树

封面设计:肖 辉

2041/05

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

倪孝铨 罗伯特·罗斯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保定市燕赵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9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00

ISBN 7-01-001534-1/D·461 定价 9.00元

序 言

1990年6月13—15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的学者在北京建国饭店举行了为期三天、题为“1971年以来的美苏中相互影响”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在世界形势发生转折的时刻举行的,因此非常有意义。本书即是提交给这次讨论会的论文汇编。

70年代和80年代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存在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同时,在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当时,国际上虽然还有别的三角和四角关系,但是它们对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形势的影响显然都不如美苏中三角关系的影响大。当然,由于美、苏、中三国的力量并不平衡,这三个国家在三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不可能相同。另外,尽管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苏、中三国的对外政策,但是它并不是影响这三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唯一因素。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其国内局势的影响。还需要强调的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苏中三角关系的具体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不同的时间里,三角关系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完全一样。本书的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70年代至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三角关系对美、苏、中三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分析或指出了这种影响的局限性。

苏联解体以后,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世界进一步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70年代和80年代,战略因素往往在大国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现在,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已经

明显上升,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形成美苏中三角关系的那些因素不会再重复出现。但是,了解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苏中三角关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在美国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举行的。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亚洲基金会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对支持这次讨论会的召开和本书的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倪孝铨

前 言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大国关系的显著特点是,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在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无论是对手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都对第三国的安全有很大影响。人们用过很多字眼来形容这种状况,其中包括“三极结构”、“三角政治”和“战略三角关系”等等。其实,大家在分析的基础上获得的共识比具体的用词更重要,这个共识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三个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同国际政治中的任何其他三边关系相比,不但更加重要,而且有质的区别。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从三角关系角度来分析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回顾 70 年代和 80 年代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际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和根本性变化。在这一时期,美苏缓和先兴后衰;中苏冲突加剧,包括爆发了战争和苏联对中国进行了核威胁,然后又在北京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实现了中苏和解;美中两国实现了戏剧性和解,美中经济和文化联系得到发展,最后美中合作又在 1989 年北京风波中寿终正寝。在发生所有这些事件的同时,美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然后越南人、柬埔寨人和中国人之间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连绵不断。这些事件也是在这些国家国内局势急剧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辞职、毛泽东的统治与去世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然后,当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时,那个时代便戏剧般地结束了。到 1989 年,冷战和共产党世界已经结束,苏联和美国都与中国拉开了距离。战略三角关系

终于寿终正寝。

本书所有的作者在分析国际政治中的这一关键时期时,都以存在着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为前提。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70年代和80年代的三角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三角中的每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政策?因此,每一章都明确反对下面这种看法,即认为国际结构决定了对外政策而且大国之间只存在着机械性的相互影响。作者们在分析三角关系对制定政策所起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三角关系与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等重要的国内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他们还承认,无论是三极结构还是其他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对制定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国际关系中,2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因此尽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存在着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但是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制定政策的根据在此期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极结构和对外政策

下面各章分析了三极结构和各种国内问题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相互影响中所起的作用。作者的出发点是,在以上两种因素中,哪一种因素都不可能在排除另一种因素的情况下单独地支配制定政策的过程。相反,他们认为,若要深刻、透彻地理解三角行为,就必须重视制定政策过程的多面性。因此,作者们考虑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三极结构和非结构性因素结合的变化情况,同时还特别注意每个具体国家的情况以及在20年的时间里国内和国际决策环境所可能发生的变化。

三极结构对制定政策的影响

本书调查了在存在战略三角关系的将近20年里,上述三个国家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三角关系而一再采取的地缘政治行为。这是用系统方法来研究国家行为的实质。但是,结构并不一定

对所有的国家产生相同的影响,而且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恰当地使用三角关系的观点,既需要注意系统对各国的总的影响,也需要注意系统对各国的独特影响。

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国际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行为。拿战略三角关系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鉴于它与其他两个国家相比所处的地位,是怎样对三角压力作出它自己的独特反应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涉及国家力量。并不是所有的战略大国生来就是平等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肯定比美国和苏联弱得多;中国并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本书中有关中国的各章都承认这一事实并且探讨了它是如何影响中国在制定对美和对苏政策方面对三极结构作出反应的。

结构的影响,也是一个国家参加某个特定的双边关系的结果。只要由于卷入战略三角关系而一再出现某些行为方式,那么这些行为方式就会在盟国关系和对手关系的不同趋势中得到反映。书中各章认为,每一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的双边政策会反映出它在三角关系中的特殊处境。因此,本书在探讨三极结构的影响时,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个国家在其所处的两种双边关系的背景中制定政策的过程。

本书从这种三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谈判情况。它探讨了三角内部不断变化的外交关系对美中关系、中苏关系和苏美关系中的双边谈判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本书还研究了双边的谈判情况是如何由于每一个国家同第三国的关系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有时加重、有时则减轻了持久的力量不对称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史蒂芬·塞斯坦诺维奇的论文第一次准确地评价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关于三角外交是推动苏联在军备控制谈判中采取灵活态度的有效手段的说法。与此相类似的是,苏起分析了美中合作给中国在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方面所带来的好处。迈克尔·亚胡达和罗伯特·罗斯则探讨了不断变化的中苏关系和苏美关系是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中的力量关系的。

制定政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政治和个人

这种对讨价还价的重视，着重说明了对制定政策过程中的非三角因素进行探讨的重要性。不考虑非系统因素，就不可能充分地解释涉及盟国和对手关系的短期决策，其中包括谈判立场、对其他国家政策变化所作的反应和使用武力等问题。虽然三角压力始终是重要的，但是它的最终影响只有在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看到。因此，作者们探讨了例如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在确定三角压力对制定政策的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们同时还探讨了三角政治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非系统因素对制定政策的影响。要理解战略三角时代制定政策的过程，就需要分析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正反两方面。

分析苏联和中国情况的作者，主要关心的是这两个国家参加战略三角关系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几章探讨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他们分析了中苏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和中苏同美国的关系对其领导人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对这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苏起、罗伯特·莱格沃尔德和赫伯特·埃利森所写的那几章，特别注意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自己卷入中苏冲突的担忧。迈克尔·亚胡达则分析了美中合作对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和对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影响。

然而，第二，作者们并没有孤立地分析意识形态问题。虽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能够产生一种抵销三角关系影响的压力，但是其结果决不是注定的。国际因素常常能够减少意识形态压力对政策的潜在影响，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尽管可以在国内问题上表现出来，却不会改变对外政策。还有一种情况是，意识形态可以加强三角关系的压力，使对外政策更充分地反映和睦关系或敌对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三角压力压住了意识形态冲动，又在什么时候意识形态与结构一起产生出一种反映这两者相结合的结果呢？

这些问题在讨论政治、外交政策时也提出来了。每一章,尤其是讨论中国和美国对外政策的那几章(因为华盛顿和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领导人问题上经历过的斗争最多)都仔细地研究了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们由于自己所扮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僵化的政治家,另一种是国家安全的保护者)而经受的互相冲突的压力。同样,关于这种冲突,也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结果。政治压力的大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美国竞选总统的季节和中国与苏联在(领导人)继承问题上所发生的周期性斗争,均对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很大的、要求他们对政治问题作出反应的壓力。另外,甚至在政治压力很大的时候,系统的压力也并不一定就被忽视。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里,三角压力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国内政治并不是机械地影响制定政策的过程。国内政治常常可以同国际压力合在一起产生出政策。另外,很可能还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即三角压力非常大,以致于大大减少了国内有关对外政策的争论,或者迫使领导人尽管要在国内政治方面付出代价,却不得不服从对外政策的利益。那么,三极结构是在什么时候制止了政治上的僵化做法,国内政治又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减少了三角因素的影响的呢?

有时候,有关对外政策的争论并不反映党派政治,而是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们在对三角压力作出适当反应方面所存在的真正分歧;对三极环境的最佳反应并不总是不言而喻的。当政策制定者们错误地估计自己国家在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并因而实行起反作用的政策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结构又是如何产生纠正政策的刺激因素的呢?与此相类似的是,决策往往需要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作出妥协,于是就引起了政策冲突。其结果可能是在政府内部就政策问题展开争斗。那么,官僚间的明争暗斗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起什么作用呢?也存在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看清楚几种互相竞争的政策选择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利弊,

从而影响政策争论的结果。

有关美国制定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的那几章直接探讨了这些问题。它们评价了赛勒斯·万斯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两人在对苏和对华政策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的重要性和在冲突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国际事件的影响。他们还评价了1982年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过渡到乔治·舒尔茨国务卿的重要性。此二人对战略三角关系有非常不同的见解,因而在有关对华政策和对苏政策的相互作用方面采取的政策也不同。

在重视个人的作用方面,还需要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或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当涉及社会主义国家时,情况尤其如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所拥有的决策权力远远大于美国的主要领导人。因此,正如苏起所指出的那样,若不探讨毛泽东个人对中国对外政策所作的贡献,就不可能了解中苏冲突何以如此激烈。同样,我们在分析苏联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在80年代的转变时,也需要分别注意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所起的作用。要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需要理解(美国)领导人的观点。有关美国政策的那几章,分析了70年代中期杰米·卡特个人对超级大国和国际政治的看法对三角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冷战以后

每一章都强调,超级大国和中国在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这些国家在冷战时期实行的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对外政策。同样,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作者们分析了三角压力和其他因素在根本的政策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变化合在一起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他们还分析了冷战的结束对他们的双边政策的影响。作者们在强调冷战后期已不存在三角外交的同时,要求人们注意每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苏联和中国卷入三角外交长达 20 年。这一时期的政策反映了制定政策过程中国际和国内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本书各章均强调这种相互影响,并探讨了在每个国家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政策中各种因素结合的变化情况。关于三极结构在制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作者们并没有提供一种单一的答案。实际上,他们明确地拒绝了这样的思维方法。作者们之所以探讨共同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国家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影响,目的在于使人们理解三角政治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罗伯特·罗斯 赫伯特·埃利森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3)
1972 年以来三角关系中的中美交往和	
中国的政策	丁幸豪(1)
1972 年以来美苏中角逐对中国的	
对美政策的意义	迈克尔·亚胡达(17)
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的	
对苏政策的影响	杨家荣(51)
战略三角关系和中国的对苏政策	苏起(70)
中国因素对苏联制订对美安全政策的影响	倪孝铨(86)
中苏关系:美国因素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109)
70 年代初以来的苏联对华政策	邢书纲(140)
苏中关系:20 年的经历	赫伯特·埃利森(165)
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张也白(197)
1970—1990 年美国的对苏政策:	
中国的影响	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226)
正在消失的三角关系:1972 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	
中的苏联因素	王缉思(249)
70 和 80 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战略背景和	
决策过程	罗伯特·罗斯(283)
结论	罗伯特·罗斯(325)

1972 年以来三角关系中的 中美交往和中国的政策

丁幸豪

在 70 年代,世界舞台发生了战后以来的重要转折:世界战略格局和美苏这两个超极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美国的经济相对衰落,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甚至比 60 年代后半期又下降许多,在 70 年代则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在同一时期,苏联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同美国的经济差距,扩充了军备和加强了军事实力。苏联不仅取得了同美国的核均势,而且还大大地加强了它的本来就超过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常规力量。

尼克松政府明智地承认了美国力量的下降,并相信世界正在从两极向多极转变,即世界已经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这些中心就是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尼克松当时认为,苏联是这五个国家或中心中唯一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美国造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尼克松还发现,由于美国已经失去了它过去所拥有的对苏联的绝对优势,它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单独地同苏联进行对抗了。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几个大国。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开始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调整自己的处境,使自己在同苏联的交往中处于更有利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经济手段使苏联发生演变。为了实行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和减少美国经济中的巨大困难,尼克松政府不再试图夺取军事优势。它从1970年开始逐年削减了军费开支,结果,1977年的实际军费开支比1969年削减了30%以上。此外,美国从世界的某些地区进行收缩,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实行逐步从该地区撤出地面部队的尼克松主义。总的来说,在70年代,美国在同苏联的争夺中处于守势。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外交季刊》(1974年春季号)上所写的那样,在60年代初,美国巧妙地设法建立一种在美国支配下的美苏缓和,但是在70年代情况就倒过来了,由于力量对比的不稳定和美国力量的下降,美国在70年代寻求缓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建立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和维持现有的势力范围的划分。

然而,苏联把美苏缓和看作是它在有限时间内加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打进楔子以及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从而捞取经济实惠的好机会。此外,在缓和的掩盖下,苏联全力以赴地扩充军备并加强了对外扩张^①,到70年代中期甚至展开了全面的攻势。苏联同时在欧洲和远东加强军事力量。与此同时,它利用美国的收缩,扩大了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和入侵,甚至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自己直接出兵阿富汗。因此,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势是: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战略调整:第一,由于美国的实力地位正在下降,因此美国有必要改变从杜鲁门时代继承下来的两极战略结构,利用中苏分裂并把希望寄托在“苏联集团的内部演变”上;第二,同苏联相比,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是更实质性的,因此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上更需要中国,但是与此同时,尼克松“想让苏联参与解决这场战争”;第三,尼克松认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构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并把中国看作是解决俄国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因此他试图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第四,从经济上来说,苏

联渴望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从战略上来说，它指望美国能帮助它对付中国。因此，也可以利用苏联来遏制中国。尼克松的战略是在美苏中三角中确保美国能占据一个最有利的地位以便从中得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在 1972 年的中国之行后不到三个月就访问了莫斯科并同苏联领导人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原因。

1969 年，由于苏联军队入侵了中国的珍宝岛，中苏边界冲突爆发。然后，苏联开始了对中国进行从中国的西北边界到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包围计划。苏联把它在亚洲的 110 万军队的 80% 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界。从 1979 年起，苏联建立了针对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的新的军区。苏联在远东部署了 2060 架军用飞机，约占它的整个空军的四分之一。苏联的太平洋舰队也扩大到 785 艘军舰的规模。苏联开始在远东部署 SS-20 导弹。它在越南和柬埔寨，尤其是在金兰湾和岬港建立了一些空军和海军基地，从而使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向南延伸了几百英里。苏联在东亚的海、空军力量的目标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而苏联部署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地面部队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在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特点是：军事上包围中国，外交上孤立中国，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正是由于苏联对中国采取了霸权主义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中苏关系才进入了敌视和对抗的时期。

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由于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尼克松政府决定通过利用大国间的相互对立和在大国间玩弄策略手腕来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实现全球的力量平衡。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使美国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性机会”，并且使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能够提出一项新的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的对华政策。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它只有向中国打开门户而同时又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美国才能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总之，同中国改善关系将不但能够被用作同苏联打交道时影响苏联的手段，而且还能帮助美

国在不丢失面子的情况下结束越南战争。

从中国这方面来说，直接来自苏联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感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愿意结束同美国的长期对抗以便适应反对苏联扩张的需要。与此同时，为了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国希望中美和解能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此外，到60年代末，中国开始批判左倾思潮，设法减少这种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并通过这种做法来恢复和扩大与外国的接触。最后，中国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进一步消除美国设置的阻挠中国积极参加世界事务的障碍。

在初始阶段，美中两国在向对方打开门户的动机方面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使我们（即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到一起来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对苏联的威胁的共同担忧和我们的下述认识，即如果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用合作来取代敌视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遏制那种威胁。”

1969年3月发生在珍宝岛上的军事冲突向美国人证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同时，它也向中国人证明中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直接威胁，并使他们相信，中国的主要对手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9月7日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和尼克松总统随后的中国之行。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署了第一个中美联合公报。

中苏分裂和中美和解给美国带来了很大好处。结果，越南崩溃对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减小了，美国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其他一些协议，美国同苏联的缓和实现了。

中美和解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但是没有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多。使中国人更加感到失望的是，从那以后，中美关系陷入了停滞状态。两国间的关系正常化（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尼克松总统的首次北京之行到1978年——化了长达7年的时间。部分